

阿拉斯加会谈之后



ISSN 2414-0783



9 772414 078005

出版 中美交流基金会

主 席 董建华

发 行人 黄德荫

主 编 张 平 常 虹

顾 问 朱英璜

编 辑 彭 慧

《中美聚焦文摘》是一份双月刊杂志，刊登中美两国具影响力的领袖和学者有关两国相关议题的评论文章。

您的意见和建议，请电邮至
digest@cusef.org.hk

公司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3号亿利商业大厦20楼
电 话 (852) 2523 2083
传 真 (852) 2523 6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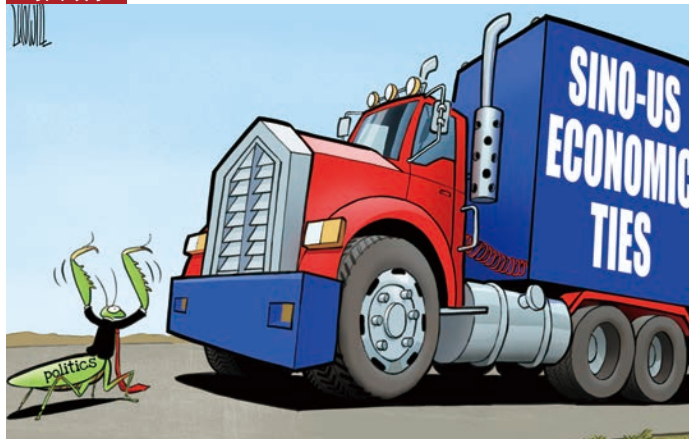
cn.chinausfocus.com

关注 Facebook 和 Twitter: @ChinaUSFocus

特别鸣谢

Chatham Strategies 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鼎力支持

封面故事



工商界应作中美关系发展砥柱

P. 06

傅莹

中美利益交融深厚。大约 85% 的中国美国商会会员没有迁出计划。事实上，大多数公司都计划增加投资，这凸显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变换修辞：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P. 11

安克雷奇会晤之后，贸易争端在新闻头条上退居次要地位。但受中美持续不断分歧影响的各界仍心怀忧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大使以其广泛的商业和外交经历，于 2021 年 5 月 6 日与“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进行了对话。



把什么装进中美合作的篮子

P. 15

安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要根据敏感性为涉华问题分类，这是不现实的。但安克雷奇对话还是取得了进展，包括双方同意开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而且重点应是进行良性竞争。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

P. 20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随着对民主价值观和联盟的强调，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已趋明朗。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是，拜登还认识到必须通过国内投资来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

国际角色的问题

P. 26

洪农

就参与国际组织来说，大国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晰。中美两国是会争夺影响力，还是能够培养合作的机会？只有后者才有助于推进健康的全球治理模式。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把握中美竞争的前提

P. 28

王义桅

美国与中国的问题缘自几个根本的误解。首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过时的苏联意识形态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应该从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

中美学者太平洋对话

我们越来越需要“太平洋共同体”

P. 33



中国 GDP 数据对美国的贸易来说是好消息

P. 38

何伟文

经济走强意味着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速度大大加快。对美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大好机会，而且不会有损失。

对话斯蒂芬·罗奇：解决流行病中的不平等问题

P. 44

数字人民币登上全球舞台

P. 48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Christopher A. McNally)

中美在军事安全领域可能的合作清单

P. 52

姚云竹

美国在亚洲备战使和平面临的威胁上升

P. 55

道格·班多 (Doug Bandow)

无法一蹴而就，没有简单答案

张 平

拜登上台后，中国已经看到它与美国疏远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

2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通了电话。3月，中美高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使双方有机会交换意见。抛开强硬的言辞不提，进展是显而易见的。

那次会晤结束后，拜登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到访上海，其后习近平主席参加了拜登发起的领导人气候峰会。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分别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和财政部长耶伦举行电话会议，给两国的经济贸易方面注入一些希望。

其他积极迹象还包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大多数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兴趣浓厚，尽管有人叫喊着脱钩，尽管新冠疫情造成了严重破坏。

然而，两国关系的前景仍阴云密布。许多人在寻求明确性和前进的方向，并期待习近平和拜登尽早会面。

在本期杂志中，我们的撰稿人也在寻找答案——中美关系目前走到了哪里？经过以接触为主要特征的40年，这一关系又会走向何方？所谓的“三个篮子方法”（竞争、合作、对抗）会奏效吗？这种方法的政策后果是什么？经贸关系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支柱吗？两国能否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问题仍在，而且没有简单答案。让我们继续探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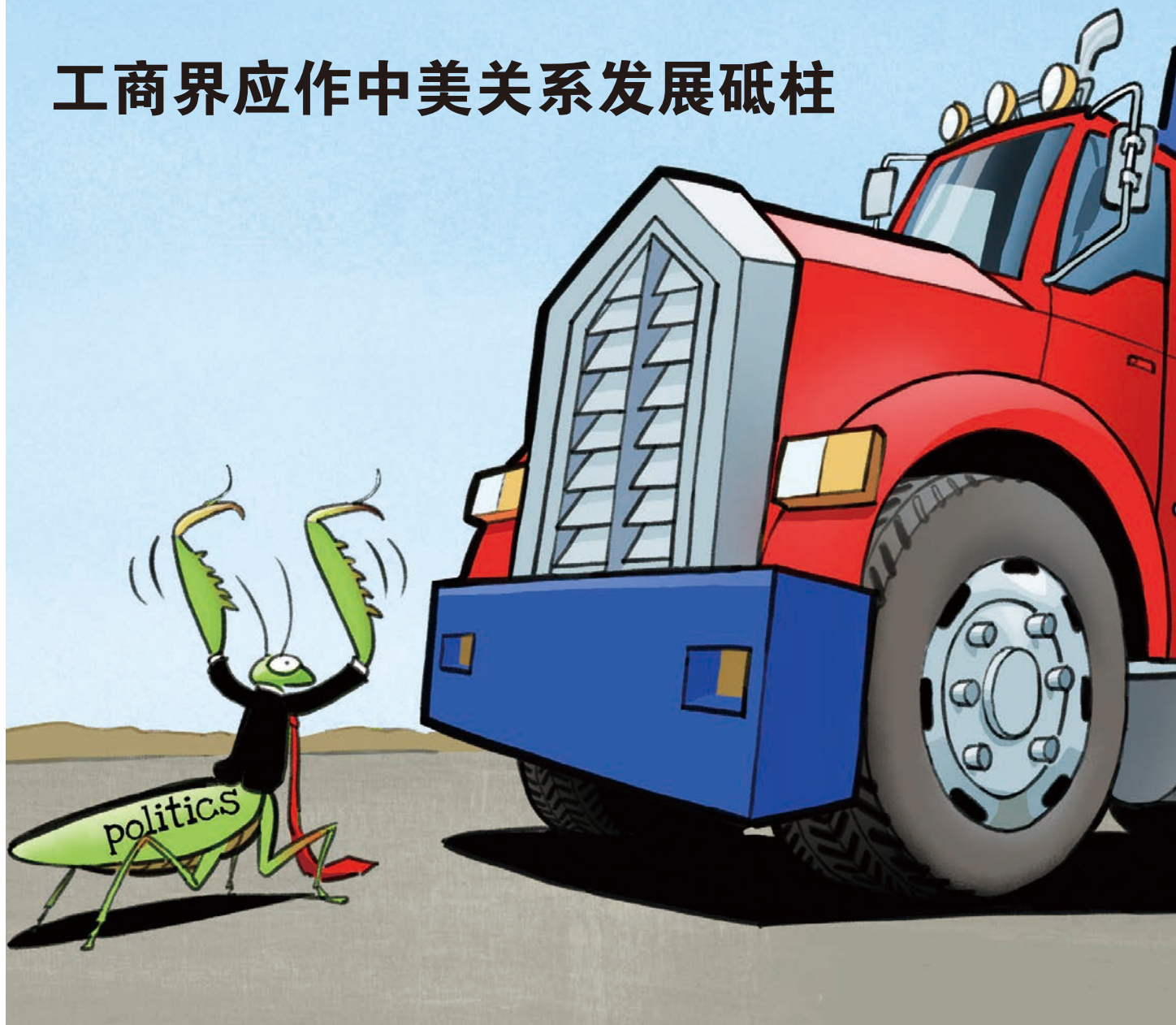
An exciting journey to
see and **hear** China
first-hand.



thechinacurrent.com [@thechinacurrent](https://twitter.com/thechinacurrent) [#thechinacurrent](https://www.instagram.com/thechinacurrent)



工商界应作中美关系发展砥柱



中美利益交融深厚。大约 85% 的中国美国商会会员没有迁出计划。事实上，大多数公司都计划增加投资，这凸显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傅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前外交部副部长

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刚刚发布的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提到，多数会员将“中美关系紧张”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的确，中美关系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由于战略互疑的上升和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两国关系面临重要选择：是滑向对抗冲突，还是走向良性竞争？

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分歧，关键是怎么做。双方需要倾听彼此，共同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但是如果选择对抗，则是另外一个局面。中美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下滑，现在处于一个平台期，如何选择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美国新一届政府似乎决心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用美方的话说，这种竞争将是“长期且激烈的”。中国则一直在强调对美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致力于构建基于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方不赞成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零和概念，容易向错误方向驱动外交行为。虽然美方表示要为“战略竞争”设定边界、进行管控、防止灾难，但是，美方的对华态度和做法无法摆脱你输我赢的零和观念。战略竞争思维排除了两国在根本利益上存

“

战略竞争思维排除了两国在根本利益上存在共识的可能性，这也就让合作成为无本之木。

在共识的可能性，这也就让合作成为无本之木。因此，美方需要谨慎定义中美竞争。

最近国际关系界学者纷纷宣告世界进入“大国竞争”的时代。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尽管挑战在不断增多，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冷战后美国在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上一直存在偏差，被霸权思维所主导，容易忽视由世界多国人民的希冀和追求所推动的和平与发展大势。中国对世界出现和平与发展大势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也是中国顺势而为、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并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

记得在欧洲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我应邀介绍中国的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时，谈到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我用英文的“trend”表达“势”的概念。同台的基辛格主动帮我解释，他对听众说：“‘势’是中国政治特有的一个概念。‘trend’这个英文词不能完全表达它的意思，可以直接用‘s-h-i’（势）”。他说：“中国人说的‘势’，就像激流从高山上冲泻下来，无可阻挡。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判断‘势’在哪里，然后带领人民顺势而为，取得成功。”我觉得他比我说得还要清楚。所以，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十分重要，而且轻易不能动摇。中国人认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大部分国家和人民的追求，对此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有许多阐述。

“

中国人说的‘势’，就像激流从高山上冲泻下来，无可阻挡。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判断‘势’在哪里，然后带领人民顺势而为，取得成功。

我们不能否认竞争的客观存在，我们主张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竞争。就像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时指出的，要“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在国际关系历史中，道路的选择都不是瞬间完成的，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互动过程。历史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由战略意志决定的，往往是在一连串必然或者偶然的事件中塑造出来。中美关系就处在这样一种流变的过程中，“终局”远未到来。

中美关系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产生的不确定性可以导致多种可能的前景。如果用全色系的“光谱”来描绘，人们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光谱”最黯的一端是矛盾不断加剧的前景，可以演变成全面危机，引发冷战式的激烈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可能性已经被许多国际学者预警，基辛格博士在去年11月的创新经济论坛上就曾发出警告，“除非（中美之间）出现某种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陷入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在光谱比较亮的另一端是相对可控和共存的前景，中美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分歧，两国关系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最终实现共同演进、美美与共（each is successful in its own way）。



在光谱比较亮的另一端是相对可控和共存的前景，中美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分歧，
两国关系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

现在的中美关系呈现比较大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双方有时矛盾激烈，有时能冷静沟通，都承认有合作的必要性，愿意探寻合作方式。如果双方能比较准确地确认彼此红线和底线，在一些关键领域达成解决或者管控分歧的共识，逐步摸索出在竞争状态下和平共存的规则，并且在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的领域保持和扩大合作，那么，中美关系有较大概率向“光谱”明亮的一端移动。

对于大国来说，处理彼此关系需要“以终为始”，决策时考虑到终极目标（当然也应是可行的目标）和为此可以付出的代价。要争取好的结果，就要避免被困在分歧里不断驱动敌意，给原非本意的负面方向增加能量。

中美建交40多年来，虽然一直矛盾不断，也曾多次出现危机，但都能及时管控，因为双方在发展关系的大方向上有共识，两国人民也都支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当年的初衷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仍然是有意义的。两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彼此的需求没有改变，甚至更大。再加上，全球各种跨国挑战的突出、新技术变革对新规则的需求等等，都为中美进一步合作提供了理由和土壤。

观察美国新一届政府，可以看到其立足点是解决国内问题，中国往往成为他们励志的比照对象。不过，华盛顿虽然认识到无法依靠向外部转嫁矛盾来解决自身问题，但是好像也很难摆脱前几年挑起争斗所产生的巨大惯性，尤其国会传递出来的信息相当负面，

舆论中充满怨怼的情绪。这些因素都会推着两国关系继续向“光谱”黯淡的方向移动。此时需要有多人勇于为中美关系注入积极因素。

合作是我们必须抓牢的纽带。习近平主席今年2月同拜登总统通电话时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拜登总统也表示美国愿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在不久前的安克雷奇会晤中，中美高官有机会就广泛议题坦率交换意见。两国气候变化特使在上海会晤后发表了共同声明，随后习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拜登总统发起的气候峰会。世人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和专业精神，也看到两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应对全球难题的愿望和能力。

中美之间能装进合作篮子的议题有很多，经贸是历久弥新的第一要素。过去人们常说，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内外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这个“压舱石”还能不能起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美方近年采取的贸易霸凌、强行“脱钩”措施，不仅没有解决工商界的关切，反而打乱了两国正常交往的秩序。

“关税战”不仅没有减少美国的赤字和促使制造业回流，反而加重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这一切也不利于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有些人觉得可以把“脱钩”限制在局部科技领域，但其风险是，无法控制可能引发的链式反应，对中美关系和全球体系的冲击仍将是全方位的。



有些人觉得可以把“脱钩”限制在局部科技领域，但其风险是，无法控制可能引发的链式反应，对中美关系和全球体系的冲击仍将是全方位的。

从今年的《白皮书》中可以看到，在美国的美国工商界保持着冷静和务实的态度。超过 2/3 的企业将中国视为优先市场，85% 的商会成员不打算将企业的制造或者采购工序迁出中国，近 2/3 的会员计划在 2021 年增加对华投资。这说明，大家对中国市场抱有信心，对中美经贸合作投的是赞成票。

我们每个人，包括在座的工商界人士，都在参与中美互动，也都在对两国关系的演变方向产生着影响。那么，工商企业界应该如何推动两国对双边关系做出合理的选择呢？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支持公平竞争；第二，保持合作势头；第三，积极促进沟通。

无论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还是中国企业在美国，都要面对竞争。两国工商界要积极探索良性竞争的路径，创造社会、企业和消费者共赢的格局。在此过程中，要学会“尊重”——尊重对方国家的政治、司法、监管制度，尊重对方市场的生产和消费文化，为两国人民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也希望你们继续协助两国政府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和公平交易规则的商务环境。《白皮书》认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建设不断取得进展，47% 的会员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在持续改善。大家看到，中国政府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同时对市场包容性、监管制度和企业合规管理、社会责任意识等问题提出关注，就两国完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提出建议。

相信你们的声音是被认真倾听的。去年 1

月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将进一步改善外资在中国的发展环境。中国在不断制定和修订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也将加强执法，扩大社会认知，努力解决企业关切。另一方面，也希望你们的声音和中国企业的呼吁能被美国政府听到，减少政治因素对正常经贸往来的干预和扭曲。

4 月初我在博鳌与柯有为公使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我们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最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两国信任的缺失。而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坚持对话沟通。

两国工商界有责任更多地站出来发声，为促进中美沟通发挥作用，帮助两国政府增进了解和信任，不仅要让两国政府听到大家的合理诉求，推动照顾彼此关切，也要让两国社会看到工商界逆势坚持运营、合规良性竞争的努力，看到经贸合作所带来的互利共赢结果。

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审议一份长达 280 多页的“对华战略竞争法案”，里面不少判断缺乏客观信息基础。大国基于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险的，工商界有责任为建立保障两国经贸稳定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做贡献。

中美利益交融深厚，合作存量巨大，未来潜力更大，这是我们对两国经贸关系前景的信心之源。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作中美关系发展的中流砥柱。

（本文为作者 5 月 11 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关税实施的时间越长，对美国和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变换修辞：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安克雷奇会晤之后，贸易争端在新闻头条上退居次要地位。但受中美持续不断分歧影响的各界仍心怀忧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大使以其广泛的商业和外交经历，于2021年5月6日与“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进行了对话。

周柳建成：

克雷格·艾伦大使，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抽出时间。在仅仅 100 天里，乔·拜登总统政府的表现就超出了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大胆预想。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变好了，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您觉这种状况会一成不变吗？

克雷格·艾伦：

我认为，必须把言辞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行动区别开来。如果你看实际的政策，几乎是没有任何改变。每次我们去问，拜登政府都会告诉我们说，正在对政策进行审议。但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一项都没有取消，除了法院介入的几个小案子，可这与制定政策还是不一样的。

而同时，从言辞方面看，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在大约一个月前杨洁篪、苏利文、布林肯和王毅的安克雷奇会晤中，这种转变就被预示或者说实际发生过了。当时刺耳的语言有些升级，事实上双方对两国关系的用辞都变差了。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是另一次措辞上的转变，说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想，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听到更多让人不愉快的话。

周柳建成：

许多人说，这些措辞和语言是为了在政治上迎合国内听众。它真的会造成长期伤害吗？伤害会落到商界头上吗，比如你代表的那些商家？

克雷格·艾伦：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转变让北京有些沮丧。拜登政府做的两件事促成了这种转变和措辞。第一件是真正重视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这是发自内心的，应该会持续下去。

“

在这两个国家，成为好的企业公民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两国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

“

在许多这类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显然互为镜像。

然而，中国却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冒犯。他们意识到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他们正在进行反击。

拜登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更多地依赖和需要与美国盟友的团结。这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就在安克雷奇会晤之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乔·拜登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这显示出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同样地，中方并不欢迎这种政策转变。

由于习近平正在筹备今年 7 月 1 日的建党百周年纪念、6 个月后的冬奥会，以及最重要的 2022 年 10-11 月举行的中共 20 大，我们也看到中国方面的一些重大转变。这种言辞上的变化紧跟国内政策走向，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两个国家，成为好的企业公民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两国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

周柳建成：

我们听说过美国与中国的差距和分歧，这些大家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您提到，比如安克雷奇会晤之前，美国与它的盟友举行了四方会议，中国人在离开阿拉斯加后也做了同样的事。那么，您认为他们都应当为这种做法及后果负很大责任吗？

克雷格·艾伦：

是的。在许多这类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显然互为镜像。在安克雷奇就很清楚，美方在会晤中首先发言，并提出人权问题，中方则立即作出反应，也提出对美方人权问题的关注。说来，美国将与盟友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合作，而中国也打算这么做。这种渗透到双边关系方方面面的镜像和对抗，正不断增多和变化着形式，给两国关系的所有要素都带来不确定性。

但在有些情况下，的确会有一些架构、系统、机构和项目被一分为二或不必要地重复，内部出现冗余，这是一国或另一国的法律要求使然。

周柳建成：

不管怎么你来我往，损害都难以自行消除。我认为可以说，如今两国关系的状况已经降到近乎脱钩的水平，一场新冷战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话题。如果发生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克雷格·艾伦：

拜登政府没有用“脱钩”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事实上，就在昨天，国务卿布林肯拒绝了“冷战”这个词。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我们在选择用历史类比来描述中美关系时，必须十分谨慎。你选择的类比会导向某种政策处方，它也许是合适的，也许是不合适的。贸易数据以及部分投资数据表明，脱钩不过是一种幻想。202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8%。至少在大多数行业，脱钩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概念。例如在消费品、农业、原材料、能源和金融方面，我们看到两国贸易有巨大的增长。真正遇到脱钩问题的是技术产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今天更是如此。两个国家都在相互进行技术限制，呼吁自力更生，呼唤安全的供应链和干净的网络。

估计最终情况是复杂的，要取决于行业。所有美国技术公司都想进入中国，所有中国技术公司都想进入美国。我想，到头来

我们会看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技术公司进入中国，这主要是为了中国和亚洲的市场。但在有些情况下，的确会有一些架构、系统、机构和项目被一分为二或不必要地重复，内部出现冗余，这是一国或另一国的法律要求使然。我再补充一点，在中国，军民融合的驱动力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主席就领导着一个军民融合委员会，这会让世界各国的科技公司再想一想，在中国开展的研发到底应该搞到什么程度。

周柳建成：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疫情，从最脆弱的社区到最发达的经济体，全世界都被它击倒。美国和中国有可能为世界上最穷困

的人带去机会。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

克雷格·艾伦：

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合作领域是气候变化，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的穷人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我认为，由于克里国务卿的努力，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但细节决定成败。

中国可以对全球经济做的最重要贡献，是在未来10年内以每年几个百分点的速度迅速增加国内消费，吸引全世界的出口，同时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出中国，这些产业越来越陈旧，而且无利可图。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家庭支出占



▲ 美中贸委会会长克雷格·艾伦和中国贸易谈判小组组长、副总理刘鹤，在2019年10月10日至11日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前进行了短暂的会晤。

“

我担心，目前对话的缺失只会助长猜疑，让那些希望夸大对方威胁的人得势。

GDP 的比例若提高 20 个百分点，那它对全球福祉的好处，会大过我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这很难做到，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让国库有更多的钱，需要改革户籍制度，需要更好地实施劳动法，需要对非洲、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这是一个长期进程，但我们应该参与这一进程，以坚定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对中国人民的好处将是巨大的，对全球经济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溢出效应。

周柳建成：

您代表着 200 多家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声音。它们是怎么对您说的？

克雷格·艾伦：

我们必须一个一个行业来看。我们的多数消费品企业对中国中产阶级扩大和消费支出强劲是很满意的。大多数农业公司也很高兴，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了。能源公司对中国继续进口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特别是炼焦煤感到开心。应该说，在服务业方面，大家是挺开心的。中国金融服务业正在进行重大改革和开放，与一两年前相比，外国公司正获得许可，并可以 100% 拥有在中国的业务。

技术领域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紧张。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它拆开来看。制药和医疗设备不同于半导体，不同于航空航天，也不同于信息技术。在所有这些领域，两国国内都是增长与压力并存，因为两国都在努力梳理地缘政治关系，来自两国政府的要求也影响着投资决策。这是一个还在持续的过程。我想我们的所有企业都想进入中国，同样，中国企业也想进入美国。

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是数据。数据传入传出的规则是什么？中国正在制定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法律，美国在这个问

题上也是争论不休，欧洲人则有另外的标准。在这个领域，各公司要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

周柳建成：

最后我想问，您对美中两国领导人有什么想说的。还有，人们对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的政策方向很好奇。她在代表总统执行命令方面有多重要？

克雷格·艾伦：

我很骄傲曾经与戴琦大使共事多年。我在各方面都非常尊敬她。她有诉讼律师背景，因此曾与 WTO 合作。她还有非常宝贵的国会背景，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贸易政策最终是由国会制定，而不是由行政部门制定。她能把握参众两院的脉搏，那里才是做最终决定的地方。贸易政策既是国内政策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拜登政府现在的重点是把国内政策搞好。在外交政策方面，盟国的作用及与全球伙伴的合作得到新的重视，这是我们在上届政府中没有看到的。我认为中国问题仍会是一个焦点。

如果两位领导人能听到我的话，我会说，我们在参与合作和竞争方面需要努力，也需要更努力地管控对抗的一面。我们两国应该在各个层面进行充分的讨论，从军事到经济、贸易、人文交往、签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我担心，目前对话的缺失只会助长猜疑，让那些希望夸大对方威胁的人得势。在不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对人做评判。真的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了解对方的观点，才能应对他们的预期，才能管控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周柳建成：

克雷格·艾伦大使，非常感谢您抽出了时间。

克雷格·艾伦：

也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为清楚起见，已对上述文字记录稍作编辑）

把什么装进中美合作的篮子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要根据敏感性为涉华问题分类，这是不现实的。但安克雷奇对话还是取得了进展，包括双方同意开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而且重点应是进行良性竞争。

拜登政府的美国对华政策审议正步步深化，新的政策锁定“长期战略竞争”，意图以复合方式升级遏制和打压，赢得关乎美国国运的竞赛。

这种政策以美国的价值观为动员工具，突出经济、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重点，倚重盟友伙伴体系的集体力量，拼凑“多对一”的优势强压局面。

这种政策依托所谓“中产阶级外交”理念，强调竞争“始于国内”，实质延续“美国优先”，出发点是处理好国内事务，同时用大规模的研发和基建投资重振竞争力，恢复美国民众对联邦民主制度的信心。

这种政策拥有国内共识基础，两党在目标设定上没有分歧，一系列跨党派立法如“对华战略竞争法案”（S. 1169）、“芯片法案”

（H. R. 7178，隶属于拜登政府推动的“就业法案”）、“无尽边疆法案”（S. 3832）等正在国会快速审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未来中美关系形态将构成深远影响。

这种政策强调“聪明”和“克制”，为竞争设定了“有管理”、“有边界”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宣称无意搞“新冷战”，“避免灾难”，另一方面承袭了特朗普时期“科技封锁”的套路，将之翻版为“小院高墙”式的策略办法。

3月举行的中美安克雷奇高层会晤既是双方一次相互探底，也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之后紧接着的是中美两国各显其能、布局竞争。

但会晤还是试探出中美各自调整的两大利益交汇点：一是同意仍有必要开展应对全

球性挑战的合作；二是意识到要避免恶性竞争，进行良性竞争。美方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不久访华，与中方谢振华特使发表共同声明，随后习近平主席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拜登总统发起的气候变化峰会，双方以行动姿态确认了这两点共识基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为两国关系的所有议题设置“竞争”、“对抗”、“合作”三个篮子。对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4月23日在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交流时致辞指出，用“三分法”来定义两国关系“没有分清中美关系的主流和支流，缺乏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只有合作才是“正道”。

布林肯的“三分法”的确不科学且难操作。首先，中美关系的所有议题都无法做绝对的性质划分，像经贸这种长期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领域如今变得极具竞争性和摩擦力，军事这种竞争性、对抗性很强的领域如今在风险管控方面做得比其他领域好，气候变化这种在拜登上台后重显合作前景的议题如果谈不拢也有可能成为对抗触媒。

其次，美方强调“该竞争的竞争、该对抗的对抗、该合作的合作”，言外之意是不希望两国矛盾和分歧影响到中国在美

“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为两国关系的所有议题设置“竞争”、“对抗”、“合作”三个篮子。

“

那么在当前新的时期，中美是否还能拥有开展合作的共同战略基础？

方关切的问题上提供配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不限制美国打压的行为，只限制中国做反应的空间，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不过，布林肯的“三分法”仍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并非全是消极面。从王毅在2020年7月提出的两国智库先行研究“合作”、“管控”、“对话”三个清单的动议看，它与中国的对美政策调整不是没有重叠之处。

中方希望的似乎是优先且实质地填充合作篮子。在中方看来，哪怕局部的竞争和对抗不可避免，也不要放任它们，不应主动往竞争和对抗两个篮子里放置议程，也不应用“战略竞争”或者“竞争”简单定义两国关系。当务之急是尽快重启对话，以澄清战略意图，减少相互怨怼情绪，在一些领域修复互信、启动合作。如果大的氛围仍不允许全面重启合作，至少要有“早期收获”。

必须承认，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既是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战”的有效工具。两国关系好的时候，合作不言而喻；竞争性、对抗性突出的时候，谋划合作的主动性不应丧失。

在谋划合作时，双方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两国合作的基础是抵御“苏联威胁”这一共同战略需要，之后融合、互利、共引全球化是



“

这一切需要超越狭隘的战略竞争和地缘角逐观念，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
需要具备人类视角、拿出政治勇气，并非想当然便可装入合作篮子。

双方合作的战略动力，那么在当前新的时期，中美是否还能拥有开展合作的共同战略基础？

一个较确信的回答是，开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共担全球大国责任，可以也理应成为新的共同战略基础。然而，这样的愿景在新冠疫情这样几百年一遇的重大全球性挑战面前部分沦空，未能实现对政治制度、价值文化、战略竞争的超越，将来还能被寄以厚望吗？而且，应对全球性挑战合作所提供的稳定性和动能足以支撑中美关系这样一个复杂体系吗？

第二个问题是，中美双方在规划合作篮子时并不缺乏工具，安克雷奇会晤“讨论了经贸、两军、执法、人文、卫生、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伊朗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一系列问题，同意保持和加强沟通协调”，无异于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合作清单，但是，这里提及的所有问题在提供潜在合作空间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中美双方应该凭借什么样的胆识和努力把它们留在合作篮子里？

气候变化显然已被优先纳入合作篮子，两国特使发表的共同声明不仅将此项合作上升到“应对危机”的高度，而且在调适温升限制目标兑现时间表等方面展现出化异求同的外交智慧。然而在落实减排、中

和、达峰目标过程中，经济增速、能源安全、技术竞争等方方面面利益必将被深度牵扯，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也必然被激发，信任危机、立场冲撞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双方需有防止气候变化问题掉出合作篮子的忧患意识。

其他跨国性挑战，比如公共卫生、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都可被装入合作篮子，目前有必要尽快开启的是在抗疫防疫领域支持加大防护物资、医疗设备等产品的贸易，支持专业机构和人士利用双多边渠道加强实验室研发、疫苗开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时就疫苗短缺、跨境旅行受阻等问题开展政府间磋商，共促疫后全球经济重启和复苏准备工作。这一切需要超越狭隘的战略竞争和地缘角逐观念，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需要具备人类视角、拿出政治勇气，并非想当然便可装入合作篮子。

“

中美双方在规划合作篮子时并不缺乏
工具。

在贸易战遗留问题未获解决前，中美经贸合作不大可能重获舆论追捧，但双边贸易在抗疫特需和经济重启作用下实际反弹明显，两国工商企业界默默做着各自应做的事。再过一段时间，疫后经济政策协调、债务风险防范、绿色金融等都将提上议程，为中美合作的篮子注入新的实质内容，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着手准备。

还有规则领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外空安全、数字安全等领域的变革也会影响国际关系形态。中美双方固然不能消除在相关领域的竞争甚至对立，但仍有空间为推动制定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和游戏规则开展对话和合作，促进全球治理。

预装中美合作的篮子不应忽略双方存在严重战略互疑和分歧的领域，那里也有开展合作的潜力。不要简单生硬地把一些问题的属性绝对化，用情绪驱动思维。比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方正会同盟友伙伴设计对冲方案，但两国不是不可能在沿线开展“第三方合作”，特别是在按国际公认标准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低碳经济方面。再比如，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尽

管战略博弈日趋激烈，但航行安全、人道搜救、海洋生态等方面的合作需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地区热点问题是中美传统协调合作领域，然而一些热点的背景和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就包括伊朗核、朝鲜半岛核、缅甸和阿富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美合作不是必然的。但没了中美合作，这些问题一定解决不了，局势失控所导致的地区动荡也必然损及中美两国根本利益。中美双方需要思考，还能不能围绕这些问题开展合作，如果不能，它们会不会变为中美角斗场？

根据新的形势设计中美合作的清单、填充中美合作的篮子，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既然双方的想法存在交集，机会就不能错失。过去几年中美对抗的氛围是如此迅速地积聚，给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都造成巨大压力。要制止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就迫切需要反映大国责任意识和合作精神和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外交智慧。当然，相互尊重和互利应是基本原则。

“

地区热点问题是中美传统协调合作领域，对于这些问题，中美合作不是必然的。但没了中美合作，这些问题一定解决不了，局势失控所导致的地区动荡也必然损及中美两国根本利益。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

随着对民主价值观和联盟的强调，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已趋明朗。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是，拜登还认识到必须通过国内投资来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



乔·拜登总统上任 100 天，其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基础和内在逻辑已变得明朗化了。虽然尚在形成之中，且各方正在进行系统性政策审议，但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来勾勒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些主要特点。

中国已经被确定为总体政策的重中之重，并跨越国内国际多个领域。作为核心，许多政策举措都围绕它制定、规划和实施。换言之，中国被看成国内外政策的“驱动器”，是一个多维度的巨大的系列挑战，需要美国政府付出全副精力和资源。

这种关系认知和政策框架绝对是一种“竞争”。这一术语前面被放置了不同的形容修饰词（拜登总统本人甚至使用了“极端竞争”）。尽管所有政府高级官员都为竞争范式背书，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还是道出了其中的些微差别。他在 3 月 3 日表示，美国的政策应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这就为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上进行有选择的政府合作，甚至为在某些国家安全领域进行对抗留了一扇门。

理解“竞争”在总统及其政府思维中的含义是很重要的。竞争有四大空间维度（国内、双边、区域、全球）和多个功能维度（经济、技术、军事、外交、文化、政治）。这

“

中国已经被确定为总体政策的重中之重，并跨越国内国际多个领域。作为核心，许多政策举措都围绕它制定、规划和实施。

“

这是一种以竞争为前提的多频谱同步措施，基本上被看成是重建和增强美国实力的手段，其目的是将来能够有效地与中国一较高下。

是一种以竞争为前提的多频谱同步措施，基本上被看成是重建和增强美国实力的手段，其目的是将来能够有效地与中国一较高下。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手段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进行有效竞争要始于国内，要对软硬基础设施、教育、研发、技术创新和国家内在实力的其他方面进行大量有针对性的投资。

在国际上，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显然锚定两大支柱：民主价值观和联盟。拜登总统和所有高级官员都反复强调过这一点。拜登本人对世界和当今时代的看法是，这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竞争，而且他表示“在我任内”前者不会战胜后者。拜登在这方面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这体现了他思维中的一种冷战风格。国务卿布林肯的讲话也对此做出了呼应。所以，北京现在理应怀疑，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价值观是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与其他民主盟友和合作者的伙伴关系同样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是铁定的政策重点（认同民主价值观），而并非“遏制”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专制国家

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核心理念。当然，这些国家也有共同的附带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破坏力和威胁性的专制政权。但是，“四方安全对话”和美国的五个亚洲盟友并不只是因为中国而存在，北约也不是因为俄罗斯而存在。

毫无疑问，拜登这套多维度的对华政策使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处于攻势，而不是被动地坐着回应中国在国内国际的所作所为。尽管在策略和侧重点上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价值观和联盟方面，但同样明显的是两届政府之间有着很大的连贯性。

这些只是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治阶层对中国深刻的两党共识。是的，必须指出，

“

所以，北京现在理应怀疑，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价值观是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

该法案是一项重要立法，而它不过是目前国会审议的约60个涉华法案中的一项而已。

仍有少数国务院退休官员、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相当一部分商界人士及其利益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恶化感到惋惜，并将这种恶化归咎于美国，他们渴望重回“接触”时代，不愿意批评中国。但这群人明显是少数。绝大多数美国政客和专家已经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美国从前的“接触”政策失去信心。这种新的共识历经数年才形成，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对中国普遍的不信任见诸各种民调，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正处在历史最低点。皮尤研究中心 3 月 4 日的民调显示，10 个美国人当中有 9 个（89%）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而非合作伙伴。这项调查显示，在所有问题领域，人们对中国的担忧都在上升。

美国担忧和反感中国的另一个关键晴雨表是国会，国会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令人瞩目的两党一致。近期制定的“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就是最好的标志。该法案从头至尾都与同中国在国内外交关系委员会以 21 比 1

的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并很可能被拜登总统采纳为正式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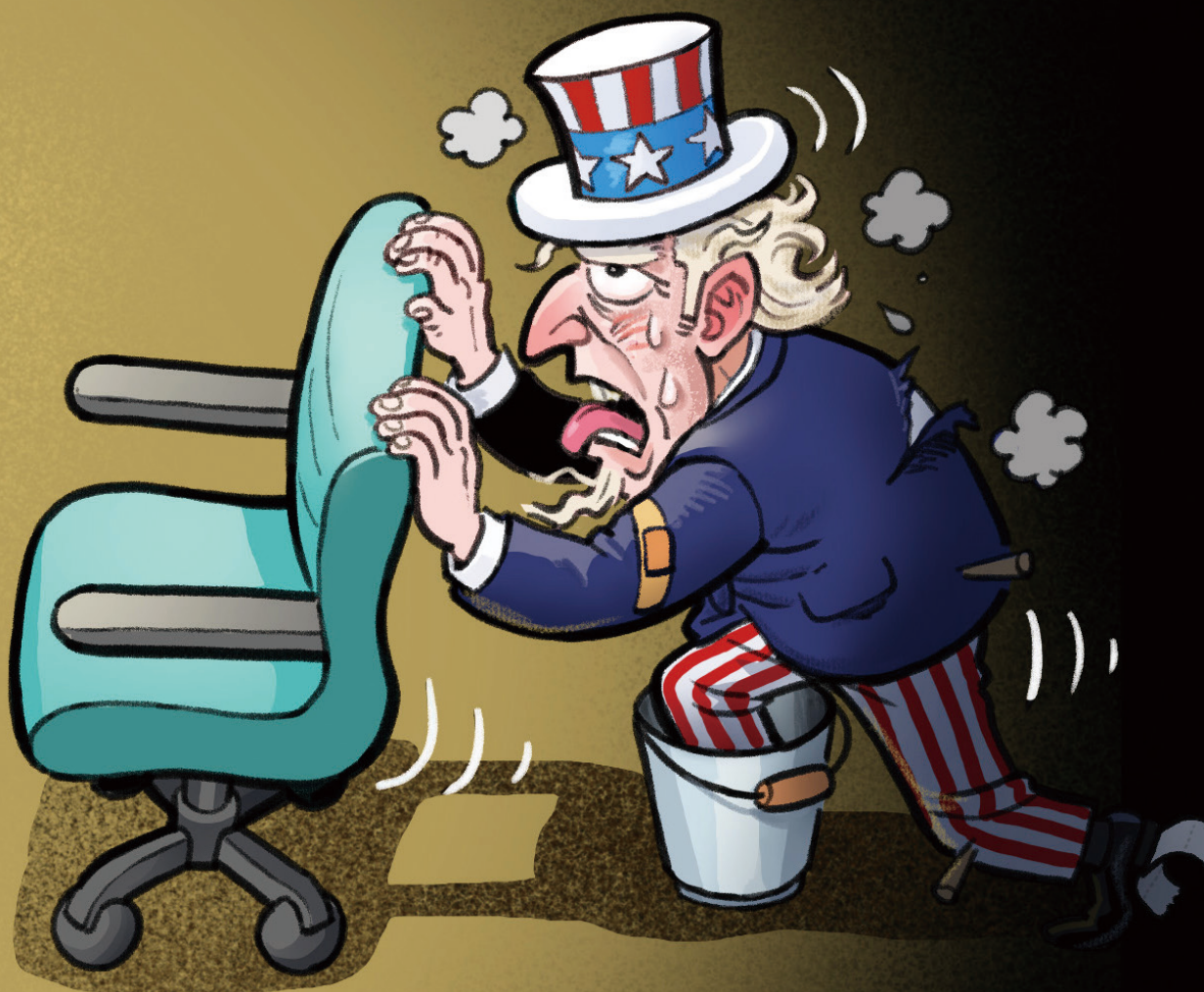
某种程度上说，该法案会束缚拜登政府的手脚，因为它详细列出了行政部门应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范围异常广泛。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与行政部门的想法吻合。该法案是一项重要立法，而它不过是目前国会审议的约 60 个涉华法案中的一项而已。这些都说明，中国带来的多重挑战是美国关注和聚焦的重心。

必须说，特朗普政府催化了这一进程，许多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和大量资源被重整用来对付中国，这让拜登政府更容易接手特朗普班子留下的工作。预计在拜登领导下，政策的协调与严格实施会有显著改善，同时会优先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不过这些都是战略和战术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实质性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看来意见相当一致。如果北京天真地希望“重启”两国关系，以加强合作，那么拜登的头 100 天说明这是一种幻想。

“

在几乎所有的实质性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看来意见相当一致。如果北京天真地希望“重启”两国关系，以加强合作，那么拜登的头100天说明这是一种幻想。





国际角色的问题



洪农

中国南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就参与国际组织来说，大国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晰。中美两国是会争夺影响力，还是能够培养合作的机会？只有后者才有助于推进健康的全球治理模式。

5月4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一份文件，列出了在主要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主要部门、基金和项目、专业机构、国际贸易与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实体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公民。

美国对此一直密切关注，特朗普政府任期过半以后更是如此。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在诸多全球事务中，美国将更多地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眼下的拜登团队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作用的想法是否有所改变，尚待观察。

特朗普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世卫组织。他还多次质疑北约的价值，并谈及要退出北约。随着他从多方面退出二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中国不再是多边机构中被动的一方。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及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推动下，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多边体系，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目前有4个是由中国人

领导的，其中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工发组织。

在美国看来，中国显然将国际组织视为扩大全球影响力的趁手工具。美国已经变得更加敏感，尤其是当它注意到，在特朗普表示对国际组织没兴趣，并取消或暂停为一些国际组织提供资金的同时，中国却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任总统的第一天，拜登就抛弃唐纳德·特朗普政治遗产中最具破坏力的部分，

“

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多边体系，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目前有4个是由中国人领导的。

“

中国在负责制定程序与标准的组织、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当中尤其活跃，特别是在最具创新性的技术方面。

并兑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加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尽管有人呼吁要国际合作不要竞争，但一些美国人指出，新一届政府不可能简单地搁置那些在后特朗普时期仍将持续、并且实际存在的地缘政治摩擦。也许，美国很难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对多边机构的优先和政策已出现倒退。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5 月 4 日发布的这份文件表明，拜登政府可能依然把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存在感的上升，视为对美国维持国际机构领导地位这一最终目标的挑战。

中国以为，对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是其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的体现：通过与世界各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发展；通过在平等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促进和平与稳定。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领域，无论是从拨款还是从派遣人数上看，中国的地位都显著上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得到联合国各机构广泛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赞扬该倡议在消除儿童贫困方面得以“使我们的影响力倍增”，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则称赞该倡议对互联互通的重视。

中国在负责制定程序与标准的组织、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当中尤其活跃，特别是在最具创新性的技术方面。中国正努力将其日益增长的科技潜力转化为机构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实际影响力，这些机构包括国际标准化

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和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建立对中国公司有益的技术标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同美国激烈竞争带来的限制。

在两国当前紧张的政治环境下，一个问题，中美会在国际组织中展开全面竞争，还是会抓住机遇加强合作，以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

答案将是喜忧参半。美国将继续保留它在全球经济相关国际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如世界银行和 IMF。而自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卫组织成为一个战场，这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安全、经济扩大到了公共卫生等非经济类国际组织。

未来，一方面，卫生、国际法和人权领域的国际组织可能成为中美竞争的新竞技场。另一方面，在国际组织的许多层面，合作已经展开，并将继续下去，例如在气候变化和海洋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北极和南极，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将有助于构建一种符合两国和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模式。

”

卫生、国际法和人权领域的国际组织可能成为中美竞争的新竞技场。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把握中美竞争的前提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美国与中国的问题缘自几个根本的误解。首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过时的苏联意识形态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应该从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

笔者曾经问基辛格博士，毛泽东主席多次在书房里接待他，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回答是：“好像没有啊，满是线装书，中国的古典。”

中国人不信神，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怎么值得信任呢？于是美国人常常喜欢用独裁、不透明、不自由、不信神、不民主、不人权、不稳定、不人道、不人性等等来形容“共



▲ 2021 年，中国各地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产党中国”。看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是重建中美政治互信的关键。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误判，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美方只有理解并尊重这一点才不会在台湾问题、新疆问题、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问题上曲解中国。

这就要克服三个重要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将中国视为可被演变的“异类”，要让中国皈依成为西方的一员，正如成功将日本收编为西方国家，忽视了中国自古自成一体，五千年文明连续不断，不可能完全变成西方模式。但是中国已经大量学习了西方文明，传统中国发展为现代中国，并向“全球中国”迈进，正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显示的。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西方与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共产党，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终于内化为



▲ 2021年3月23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学生们挥舞着党旗，准备观看电影《建党伟业》，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正如历史上佛教终于融入中土文化，成为佛学、禅宗一样。

第三个误解是认为中国革命捡了被西方所淘汰的异端学说——马列主义。实际上马列主义已经中国化，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苏联模式，即落后的俄罗斯农奴制、斯拉夫文化与共产主义革命学说相混合的怪胎，而是与五千年辉煌的中华文明相结合。

消除这三个误解，要从一百年、五百年、五千年三个

维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关键词从“共产党 / 共产主义”转变到“中国 /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运动、制度转变到文明，实现了中国化。令人忧虑的是，美国人越来越从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看中国，而非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中国。人们也没有从学理上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大一统、世俗文明有什么内在关联，它如何从原来的革命党、执政党转型到治理党。

五百年：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盛极一时，也造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体系，成为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现在还变成了最大的数字化国家。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转型，中国

“

消除这三个误解，要从一百年、五百年、五千年三个维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共产党有关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基因是什么？

五千年：中国共产党契合了中国的世俗文化，适应并维护了大一统局面，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土壤结出的果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文明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体现了人类文明东西互鉴，开创了人类新文明。中美战略对话可围绕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开展，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化等新领域探讨背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逻辑，共同实现人类公平正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年之际，美国人理解并重塑共产党观，并籍此重塑中国观是十分有必要的。其要旨是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三个关键词。

共产党已经中国化。中国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将传统的“均贫富”、“天下大同”理想转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全面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可从《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找到文化基因：“圣人无

“

美国人理解并重塑共产党观，并籍此重塑中国观是十分有必要的。其要旨是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三个关键词。

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之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合文化，不是革命斗争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理念，不再强调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命运与共，同时与各种文化初心共鸣，比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是美国人理解的选举，而是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也就是不断被历史检验。具体到官员任命是选举加选拔，正如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贤能政治》一书所揭示的。

位于中国成都的毛泽东纪念碑。中国
共产党成立之初，
中国曾受到列强的
羞辱和蔑视。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正日益强
大。2020年，中
国成功遏制住了新
冠肺炎，并迎来强
劲的经济复苏。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假装成为了民族国家”。中国传统世俗文明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化，世俗文明不是信仰宗教，不是不信神，而是不信单一的神（儒道释并存，是宗教还不如说是文化），尊重信神自由，也尊重不信神自由，所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最大程度地开放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什么是共产？不是国民党污蔑的共产共妻，也不是美国人想象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中国的所有制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么简单。关于民营经济有“56789”的说法，就是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 90% 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共产”的概念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富裕、天下为公。今天，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总书记得民心的地方。

什么是党？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革命捡了被西方所淘汰的异端学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林肯总统讲民有民治民享，为孙中山先生吸收发展为“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吃苦在前），也是公仆（享受在后）。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它追求人类公平正义，倡导人本主义。

美国担心中国赶超美国，这很自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回到汉唐，也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提供更好、更包容和更优惠的公共产品。从中国传统文化就不难理解，

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称霸，而是反对霸权，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为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群龙无首从个人修养而言是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秉承传统文化理念，中国共产党将反霸作为外交传统。邓小平讲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反对称霸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霸权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事实证明，把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于中国，归结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当初特朗普总统对华发起贸易战，解决不了美国产业回流、资金回流、就业机会回流问题，反而让中国更强大。今天换种方式打压中国也解决不了美国领导权问题。反过来，中国可能是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伙伴，而不是造成美国问题的原因。

重建政治互信，首先要解决认识论问题。要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史的高度理解中国共产党。中美可就中国共产党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全球化核心价值观展开政治对话，累积互信，避免误判。

“

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

The Pacific Dialogue



The Pacific Dialogue is a new way to virtually connect thought leaders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o continue frank and direct conversation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我们越来越需要“太平洋共同体”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

如果我们只把中美关系看作一种权力游戏，一种零和的权力游戏，我们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麻烦。

“

我不想说亚洲其他国家应当是美中两国的“婚姻顾问”，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意思。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认为，阿拉斯加对话给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了新的问题。强硬的措辞、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话结束后联合声明的缺失，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外交风格。但对于两国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是集中力量应对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

“太平洋对话”主持人周柳建成邀请两位教授就此展开辩论，并请他们回答了有关“太平洋共同体”倡议的问题。

周柳建成：

在本期“太平洋对话”节目中，我们迎来两位引领我们理解全球事务的人物。北京方面，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华盛顿方面，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荣休教授大卫·兰普顿。我是周柳建成。有太多话题需要他们的参与，包括由他们牵头的“太平洋共同体”倡议，以及对阿拉斯加对话的回顾。

我们就从阿拉斯加开始吧，它是两国之间具有象征意义的中间点，2021年3月他们在那里举行了对话。这是一次内容非常广泛的讨论，但就你们二位而言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呢？

王缉思

我认为，阿拉斯加对话是拜登入主白宫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首次高级别面对面会谈，这本身就是重要的、积极的，因为它表明双方都愿意讨论彼此面临的艰难挑战。我相信他们还讨论了朝核、气候变化等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公众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公开的争辩上。我猜杨洁篪对安东尼·布林肯的那一长篇强硬回应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这很自然，因为布林肯提到新疆和香港，触及了中国人的敏感话题。就在他们启程前往阿拉斯加之前，华盛顿制裁了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官员。杨的那番话在媒体上获得数百万中国公民点赞，所以这也是他个人的成功。杨和王毅的态度符合中国官方的立场，也符合公众的心态。最近，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现在可以抬起头面对西方世界了，我认为这反映了一种新的外交风格，而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持续下去。

大卫·兰普顿：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演戏，两边都有自己的听众。我想，美国人是说给他们海外盟友听的。主要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必须表明它在努力，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有别于早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这也意味着在美国政坛的政治语言中，对中国会更强硬。杨洁篪发表长篇讲话后，网上出现不少语气强烈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开场发言加深了双方彼此之间的坏印象。而这似乎告诉我，会晤结束时是不会有联合声明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中美是部分竞争、部分合作的关系，那次会晤当中我们确实展示了竞争，但我没看到有多少合作。

周柳建成：

乔·拜登在白宫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有一个总体目标。我不会因为这个目标批评他们。但他们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这在我任期内是不会发生的。”王教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缉思

当然，很多中国人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如果我们只把中美关系看作一种权力游戏，一种零和的权力游戏，我们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麻烦。首先，中国在经济、军事、技术、教育等综合实力上远远落后于美国。第二，中国的最终目标不应当是取代美国成为第一，而是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保护环境和提高教育水平方面做得更好。第三，

“

现在双方都在世界各地努力营造组织，
在竞争关系中拉大国作朋友。

——

我们应该进行和平、良性的竞争，看哪个国家在国内重建方面做得更好……而不是哪个国家在军事上更占优势。

大卫·兰普顿：

所以，我非常同意这个一般命题：优势地位不仅是一个有害的目标，基本上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就算全球化没有别的，它也让其他国家拥有了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安克雷奇会晤最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人的出访行程安排，他们去了日本和韩国。我不是批评，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但从某些方面看，这是在集合支持我们的队伍，让我们的盟友有信心。要是看一下安克雷奇会晤之后的日子，王毅外长是去桂林，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然后去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我担心的是，我不想说我们是处在某种冷战当中，处在那种分成两个阵营的世界里，我们还不是，现在要复杂得多。就像我说的，没有谁能主宰一切。但是，现在双方都在世界各地努力营造组织，在竞争关系中拉大国作朋友。

“

但如果我们只把中美关系看作一种权力游戏，一种零和的权力游戏，我们就有可能
让自己陷入麻烦。

——

周柳建成：

你们所在的北京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院都在倡导我们所说的“太平洋共同体”，这是受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启发，是设想一个共同的事业，去力求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什么在所有可以投入的计划当中，你们选择致力于做这种特殊的努力呢？

王缉思

2016年以来，在董建华先生的鼓励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基于建立“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战略愿景，与兰普顿和美方人士，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一起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观点可能是，除非中美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否则区域共同体不可能达成。事实上，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恶化，今天的情况甚至更糟。所以，要是我们坐等中美关系改善的话，我们现在恐怕还在等。

大卫·兰普顿：

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概念方式是，当美国和中国有自己的难题时，这些难题通常出现在中国的周边，无论是朝鲜半岛、日本，还是在东南亚。如果回顾冷战，你会发现冷战中的大规模冲突大多发生在亚洲和中国周边地区。我认为，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想法，特别是其他国家，尤其东南亚国家，是它们真的不希望看到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所以，它们多少在起平衡的作用。我想，它们总体上会推动这个体系朝着缓和、合作和

“

我不想说亚洲其他国家应当是美中两国的“婚姻顾问”，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意思。

关注经济双赢问题的方向发展。我不想说亚洲其他国家应当是美中两国的“婚姻顾问”，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意思。

周柳建成：

我很喜欢“婚姻顾问”这个比喻。兰普顿教授，当世界蜷缩、封闭起来的时候，您出版了关于中美与东南亚关系的新书。您认为“太平洋共同体”倡议会接纳更多国家吗？会不会采取比如国家会员俱乐部的形式呢？

大卫·兰普顿：

我想人们可以看看欧盟，特别是英国脱欧前的欧盟。我认为亚洲内部的差异远远超过欧洲，亚洲地区更加多样化，整个亚洲在文化和宗教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东北亚与东南亚就非常不同。所以，我并不期待这个“共同体”会像我们传统上认为的欧盟那样紧密联结。但我认为，东盟这些年越来越成功，它是按协商一致原则运作的。

王缉思

当我们用美国的术语讨论亚太——现在是印太——地区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包括哪些国家。不像欧洲，对欧洲，你多少能分清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区别。但说到亚洲，有印度，甚至有澳大利亚，有毗邻太平洋的加拿大。所以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是，亚洲是什么？什么是亚太或印太？

周柳建成：

中美关系未来的状态显然为全球所关注。气候变化被认为是让人有强烈兴趣去挽救和

“

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是，亚洲是什么？什么是亚太或印太？

“

随着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规模，越来越具有专业性，用共同体方式解决问题的观点会越来越有力，而不是相反。

恢复这一关系的领域。这种务实合作的方法是否非常接近亨利·基辛格博士等人的构想，即用共同目标的细化来取代战略不安？

大卫·兰普顿：

我认为，美国对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的任命是非常可靠的一步。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认识所有的参与者。坦率说，我不知道中方的具体阵容，但解振华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气候变化负责人，我认为他是可信的。很明显，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关生存的威胁，没有美国和中国，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说还应该有印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极其可行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都有好的人选。

王缉思

当然，气候变化对中美合作至关重要，但还不够。即使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也有国内政治问题要考虑。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对此不感兴趣，甚至反对将气候变化作为全球合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公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中国抓紧时间制定了一个公开计划，要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但纵观整个社会的话，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审视形势。除了气候变化，我们还有其他环境问题要考虑。

周柳建成：

我只愿早日达成“太平洋共同体”倡议。你们这项工作涉及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它的时间表和范围是否因为当前的疫情而有所改变呢？

大卫·兰普顿：

我认为，疫情使共同体这一想法和跨国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证自明地有必要。我的意思是，看看世卫组织和对流行病信息的需求吧，我想，随着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规模，越来越具有专业性，用共同体方式解决问题的观点会越来越有力，而不是相反。

王缉思

今天上午，我听到中美相互指责对方是疫情源头的新闻。这是政治化，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大卫·兰普顿：

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应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流行病学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就事实进行辩论。但我们不该只因无法在源头问题上统一看法，就阻碍在众所周知问题上的合作。

周柳建成：

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卫·兰普顿教授，非常感谢你们抽出时间，分享你们的专业能力和洞察力。

（为清楚起见，已对上述文字记录稍作编辑）

“

即使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也有国内政治问题要考虑。



中国 GDP 数据对美国的贸易来说是好消息



何伟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走强意味着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速度大大加快。对美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大好机会，而且不会有损失。

不出所料，中国今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幅达到惊人的 18.3%。这是基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的低基数，当时由于新冠疫情暴发，中国 GDP 下降了 6.8%，为 59 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若与疫情前的 2019 年第一季度相比，今年第一季度 GDP 增长 10.3%，相当于年均增长 5.0%，比疫情前仍然大约低 1 个百分点。

驱动力和变化

第一、第二产业总体来说已经恢复正常增长，平均增长年率为 2.3% 和 6.0%，2019 年是增长 3.1% 和 5.7%。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去年和今年的增长率仅为 4.7%，而 2019 年则增长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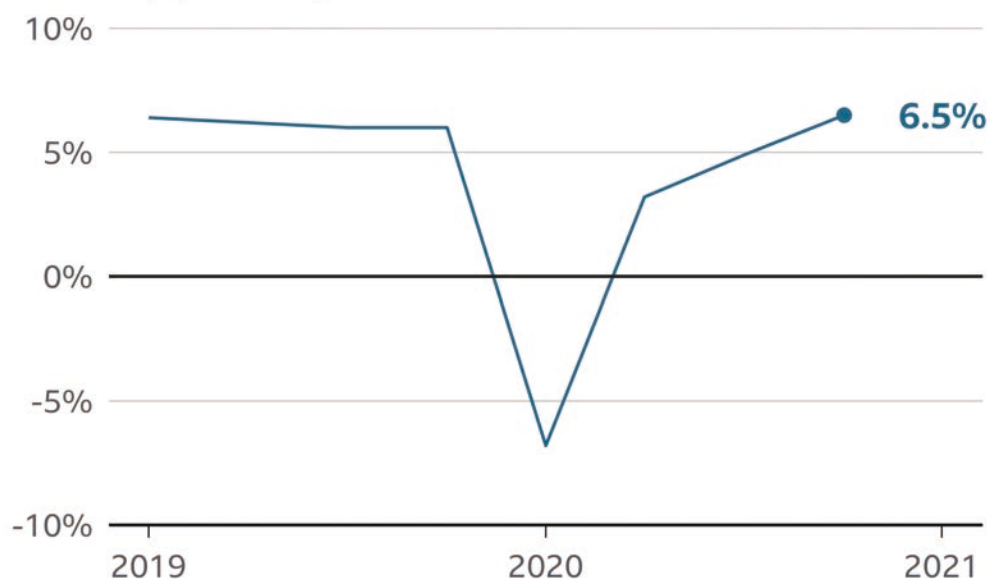
高科技产业是经济的主要引擎，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微型计算机、集成

电路的同比增幅超过 60%，过去两年平均增速达到 19%。货物进出口为另一个引擎，进出口总额超过 1.3 万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 38.6%，比 2019 年第一季度增长 20.9%。过去两年进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 10.0%，是 2019 年全年增长率（3.4%）的近 3 倍。这意味着贸易增速已经高于趋势线，其中出口的表现好于进口。今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 49.0%，进口增长 28.0%，净出口对 GDP 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将发生变化，第三产业将获得增长势头，净出口涨势则将趋于平稳。最近的指标显示，第三产业出现迟到的反弹，3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2%，比 2 月

2020 年，中国是世界唯一实现增长的经济体

Quarterly year-on-year GDP



Source: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

随着世界许多地区快速复苏，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净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将失去增长动力。

份提高 4.4 个百分点。

住宿、餐饮和租赁已回归繁荣区间，铁路、航空运输、金融、互联网服务的商务活动指数也都在 60% 以上。随着工业生产快速扩张，与工业相关的服务业将更快增长。看来，第三产业在第二季度会有更高的增长率，并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加速。第三产业占 GDP 的半壁江山，其加速发展将为整体经济提供新的决定性驱动力。

然而，随着世界许多地区快速复苏，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净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将失去增长动力。

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进一步支撑下，工业生产将继续保持目前的强劲势头。总体而言，2021 年中国的 GDP 增长会在 9% 左右，略高于 IMF 最新估计的 8.4%，不过 2019 年至 2021 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 5.5%，仍比疫情之前的年份要低。

推动全球复苏

与去年不同，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情况将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将不再是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复苏将是广泛的，IMF 在 4 月 6 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经过 2020 年下滑 3.3% 之后，全球 GDP 将增长 6.0%。发达经济体将增长 5.1%，其中美国一马当先，将增长 6.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 6.7%，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 8.6%。

中国也将不再是增长最快

的主要经济体，印度的增速预计为 12.5%。去年中国 GDP 已经占到全球 GDP 的 17%，今年中国 GDP 若增长 8.4%，将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 1.4 个百分点。如果美国 2021 年 GDP 增长率达到 6.4%，那么它将贡献 1.6 个百分点。把 2020 年和 2021 年合起来的话，世界经济将增长 2.5%，其中中国将贡献 1.7 个百分点，是最大的贡献者。

贸易的新动力

自相矛盾的是，被普遍认为因贸易战而陷入低迷的中美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成为亮点，同比增幅达到 73.1%。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长 74.7%，自



▲ 2020 年以来，中国不仅控制住了国内疫情，还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

“

如果美国的出口在今年剩余时间里保持3月份的增长势头，那么2021年美国对华出口将历史上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并超过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首年目标。



美进口增长 69.2%，与 2018 年第一季度贸易战前的高水平相比，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19.3% 和 11.7%。换句话说，事实上，麻烦不断的中美贸易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 GDP 的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除非出现重大意外挫折，否则 2021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过 2018 年创下的 6335.2 亿美元（中国海关数据）。

3 月份，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更快，达到 172.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4.8%，超过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 53.3%。如果美国的出口在今年剩余时间里保持 3 月份的增长势头，那么 2021 年美国对华出口将历史上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大关，并超过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首年目标。

别忘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额外关税和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反制关税仍然存在。最新发展状况说明，随着美国经济强劲

复苏，中国产品是符合其市场需求的。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也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因为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增长。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全球农产品的进口同比增长 33.8%，汽车进口增长 30.2%，机床进口增长 29.2%，飞机进口增长 100%，机械和电子产品进口增长 30.9%，高科技产品进口增长 31.0%，这其中美国出口商占有很大份额。

中国经济的增强也意味着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20 年，中国成为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唯一增长的目的地。2021 年第一季度，流入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达到 448.6 亿美元（非金融类），比低迷的 2020 年第一季度增长 43.8%，甚至比疫情前的 2019 年第一季度高 24.8%。同样的，对美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大好机会，而且不会有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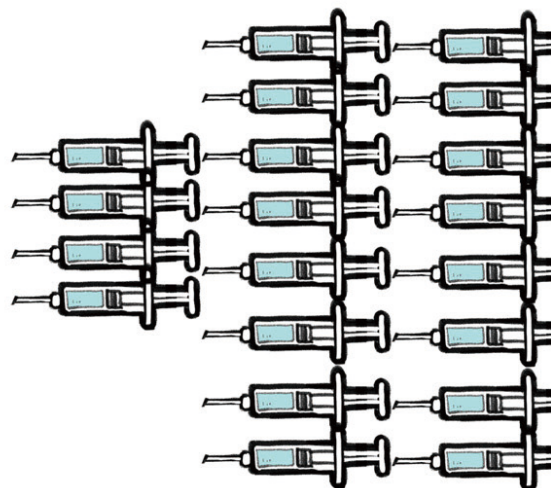
”

自相矛盾的是，被普遍认为因贸易战而陷入低迷的中美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成为亮点，同比增幅达到 73.1%。

VA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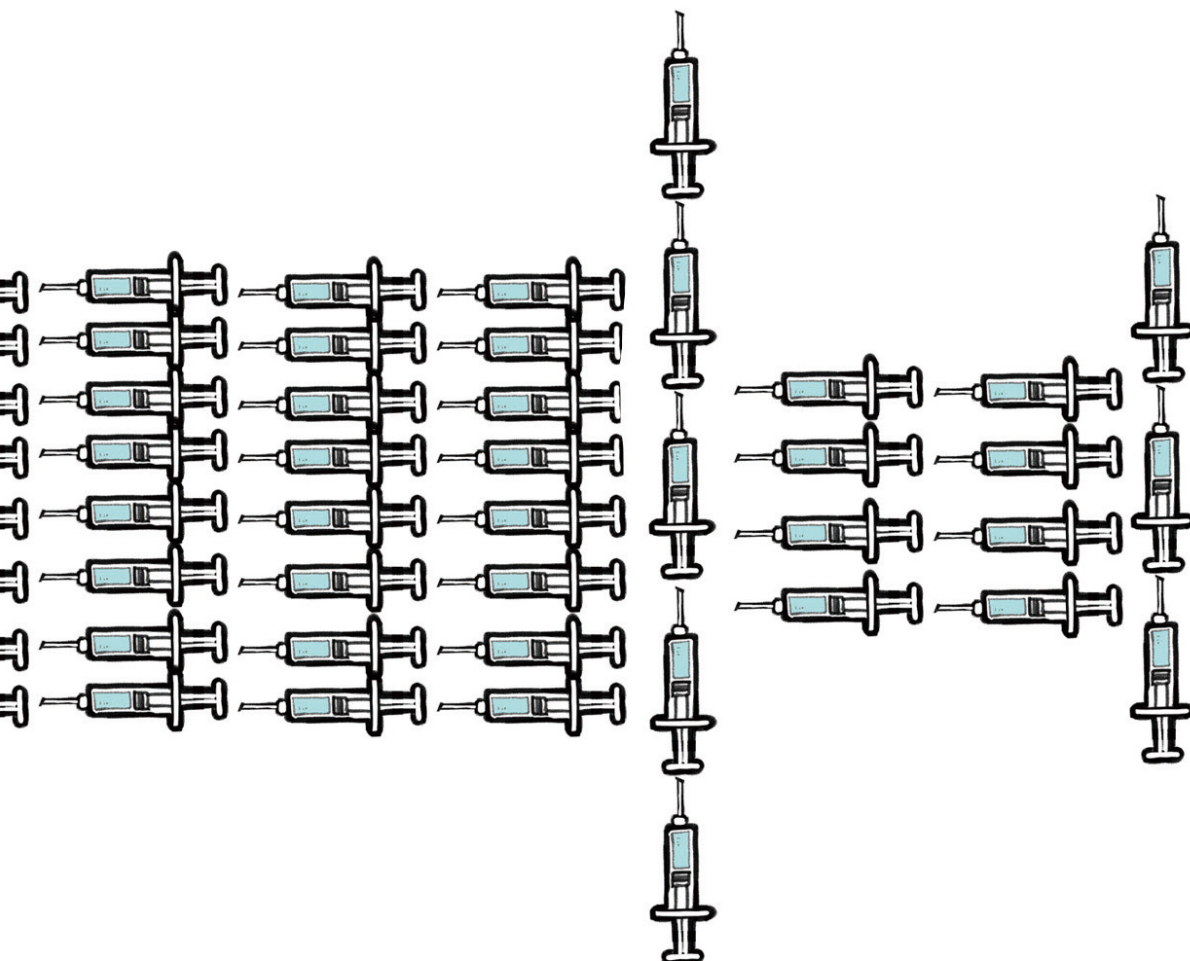


FOR
POOR
COUNTRIES



FO

CINES



OR RICH COUNTRIES

WOW!
CHINADAILY

解决流行病中的不平等问题

斯蒂芬·罗奇作为国际知名人士，曾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每一项统计数据背后都有一个人和一段故事，在 2021 年 5 月 7 日接受“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采访时，他谈到当前的挑战，包括全球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需具备的理念。

周柳建成：

您是全球经济方面的专家，写过许多书，包括您在 2014 年写的《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您认为是什么情况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平衡？

斯蒂芬·罗奇：

那本书以一个很棒的问题收尾。我表示，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别是美中之间，并不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关系。风险在于，其中一方会按照自己的路径走，而这会导致落后的一方做出被动反应。随着中国重新平衡，美国有些落在后面了，作为受到鄙视的伙伴，美国进行了回击。过去四年，我们目睹了一场极具破坏力的贸易战，不幸的是，在拜登执政头几个月里，这场贸易战似乎还在继续。

周柳建成：

您最近的文章提到两件事，一是安克雷奇高层会晤，还有就是不能忘了一直存在的贸易逆差。您会建议华盛顿和北京怎么做呢？

斯蒂芬·罗奇：

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拜登政府都陷入了美国当前两党一致的反华情绪，这使它的政治战略更难摆脱眼下的冲突。然而，这却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做的，就是要以坚

定、有时甚至是勇敢的立场，顶住两党支持的这股浪潮。我想敦促冲突中的两个国家做三件事：第一，结束贸易战，降低关税，取消所谓的“第一阶段”采购要求，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切实际的战略。第二，寻找共同利益领域，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政策，在这些领域可以重建信任。第三，不要回避棘手的结构性问题，如创新、实力政策、技术转让、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要用一个更加系统化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经开始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周柳建成：

双方有足够的力量、意愿和宽容心朝你提出的这个方向前行吗？

斯蒂芬·罗奇：

能力？有。意愿和宽容心，却是这场冲突中最难的两点。且不论对错，中国现在很难原谅对其目标提出质疑的人，特别在经历

“

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拜登政府都陷入了美国当前两党一致的反华情绪。

—————

“

但对美国和它的安全机构来说，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要合理化或要进行解释是以后的事。

了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的所谓“百年屈辱”之后。而美国也觉得很受伤，因为它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同时还承受着贸易逆差。它往往把责任推给别人，30 年前对日本是这样，今天对中国也是这样。但美国贸易问题是多边的，2020 年它对 96 个国家有逆差，美国无法靠对任何一个国家采取双边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 30 年前的日本。

周柳建成：

我们可否回到安克雷奇？因为这与您近来对双方言论和紧张局势升级的深切担忧有关。您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双方都有人——不止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呼吁脱钩。这种脱钩威胁有多少现实成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想成是，一方要套上他们的马车，与另一方分道扬镳？

斯蒂芬·罗奇：

脱钩是一个很难摸透的概念，但也有一些可见的现象，当然是从美国方面，它正在努力减少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依赖，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对华为及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众多供应商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种观点认为，当然未经证实，认为无论现在还是以 5G 技术为主的将来，华为都对美国电信平台的完整性构成严重的存亡威胁。这种意图无从证实，但对美国和它的安全机构来说，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要合理化或要进行解释是以后的事。我认为

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供应链不仅对连接美国和中国至关重要，对美中两国连接全世界众多其他国家也至关重要。构建当前全球化供应链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将它们拆解或使之脱钩，其结果会让人痛苦不堪。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在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之前，要先判断沿着脱钩这条路走到底的理由是否成立。

周柳建成：

当然，全球问题比中美两国问题更大更深。环顾世界，许多经济事务的先后顺序已被重新调整，特别是过去一年，因为出现了疫情。这一系列行动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持久影响？

斯蒂芬·罗奇：

仅就疫情来说吗？

周柳建成：

是就疫情来说，也包括导致这一结果的行动，以及您认为接下来全球情况会是什么样的。



斯蒂芬·罗奇：

疫情暴发前，世界经济其实已经相当脆弱。根据 IMF 的数据，2019 年全球 GDP 增长已经放缓到大约 2.9%。记得疫情暴发前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说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认为的全球经济衰退门槛——世界经济增速只有 2.5%。我写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新冠疫情就要来了，但我警告说，鉴于 2019 年的增速如此之慢，只要有一场冲击，就会轻而易举地让全世界陷入衰退。这种事还就发生了。虽然世界现在似乎开始复苏，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无视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的潜在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经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认为我们可以自诩这个世界已经更强更大更有复原力，那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看到了我认为不可持续的巨量资金注入，这是一场超低利率水平下的货币财政刺激，它不是后疫情时代管理世界的良方。

周柳建成：

您会要求我们如何进行准备呢，特别是那些受疫情不平等冲击的世界最脆弱群体？

斯蒂芬·罗奇：

这是个好问题，我自己也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危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优选项和价值观，这些优选项和价值观塑造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手段，塑造了各种制度应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难题的方式。你刚才使用“不平等”一词，它在新冠危机的后果中非常明显，我们甚至现在就可以谈后果了。在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目前还完全不是谈后果的时候，但疫情肯定已经给最没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造成巨大破坏。主要央行和财政当局实施的政策，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好处超过给实体经济的好处。我们常常说起股市强劲反弹带来的财富效应。想想什么是财富效应，那是

为了帮助富人，而不是穷人。所以，从健康、政治紧张和经济回报的角度看，这是不平等的复苏，这种不平等与日俱增、广泛存在、令人担忧。我认为，疫情后的世界必须彻底解决这个不平等问题。

周柳建成：

最后，我想问罗奇先生，对于塑造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且不管这个时刻何时到来，中国和美国可以做什么？这两个国家对世界命运的影响非常大，而就在六年前，乔·拜登、巴拉克·奥巴马、习近平和潘基文在巴黎协议的制定和执行上还合作得很好。在 2021 年和将来的时间里，气候变化能再次改变游戏规则吗？

斯蒂芬·罗奇：

我认为，气候和全球健康是中美有着共同利益的两个领域，可以为重建信任发挥关键作用，这种信任已经被这场破坏性的贸易战毁掉了。信任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如果两个国家能携手抗击生存威胁，它们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一些棘手的贸易和结构性问题。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中美两国都对气候变化、排放达峰和零碳目标做出了认真的承诺。只要我们在这方面继续推进可执行的协议和进程，那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发展。我希望同样取得进展的，还有全球的卫生政策，要缓解疫苗民族主义带来的破坏性紧张，因为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国家远不如发达国家安全。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有科学家在做这件事。你之前问，我们是否有做这件事的意愿，这会成为后疫情时代的终极考验。

周柳建成：

最后我想回到您的角色，很多人都记得您，曾经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长期担任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有远大的抱负。很多



从健康、政治紧张和经济回报的角度看，这是不平等的复苏，这种不平等与日俱增、广泛存在、令人担忧。

人始终对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热门话题感兴趣。凭您的工作经验来预卜的话，您认为 25 到 50 年后中美两国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斯蒂芬·罗奇：

我认为技术与生产力的交会是一个领域，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主席，以及现在作为学者，我已经研究了 35 年。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进展，并转化为可衡量、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这并非易事，特别是有气候和疫情等外部因素介入的时候。很明显，中国已经注意让本国技术平台的技术引进，避开有可能下重手回击自己国家，这取决于进口技术以什么方式进入自主创新平台。自主创新是由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有争议的方式从别人那里获取创新。同样，美国自己也必须加倍努力。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是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但我们的研发投入不足，我们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我们创建了非常强大的技术平台，它们正在推动全世界的生产力变革。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将来还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要再回到创新、技术和生产力的交会，特别是在这个全球供应链互通互连的世界上。未来几年，两国在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方面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周柳建成：

显然您很关心这个世界，关心世界现状和其中的人性。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想对生活在当今混乱的世界、且对未来充

满困惑的人们说什么？只是作为斯蒂芬·罗奇，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学者，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斯蒂芬·罗奇：

这是很贴心的问题，我想你从政客那里得的简单回答是，我们是韧性的种族。我们一次次地经历这些，总是能恢复过来。看看经济数据，封锁期间迅速崩溃，重新开放后又强劲反弹。而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根据解禁后的反弹数据进行推算。当然，解禁后我们的数据会很强劲，但在充满信心大谈我们体制的内在复原力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复原力是努力获得的，不是天生就有的。新冠疫情的教训，气候变化的教训，让发展中国家仍饱受贫困之苦的教训，使强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像印度这样的潜在强国令人担忧地提醒我们，大家需要做些什么，来让我们的系统在将来更有自我恢复能力，距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仍然受着潜在破坏性不平等影响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对复原力有长期和认真的考虑。

周柳建成：

斯蒂芬·罗奇，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仔细倾听。谢谢您如今还在为世界提供指导建议。

斯蒂芬·罗奇：

非常感谢，我很荣幸。

（为清楚起见，已对上述文字记录稍作编辑）

数字人民币登上全球舞台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Christopher A. McNally)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中国正努力通过使用数字人民币，令自己成为数字货币的全球领导者。其最坏结果是瓦解全球金融体系，最好结果是建立起一个拥有同样货币锚的全球基础设施。

近几个月，随着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价格创下新高，加密货币热引起大众的兴趣，并引发对加密货币技术的价值与意义的激烈辩论。然而，该领域最重要的进展并非私人加密货币的吸引力增加，而是围绕提供首个“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争夺加快了步伐。在这场竞争中遥遥领先的是中国，它正在进行人民币数字化的高级阶段试验。

这种新数字货币的缩写是“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官方表述有时加个斜杠，写作“DC/EP”。这体现了它的双重结构：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一级控制数字代币的发行，比它低一级的是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实际服务的电子支付平台，包括银行和支付宝、微信等支付程序。



“

对北京而言，人民币需要实现国际化已经从一种理念，迅速转变为必要的目标。

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阐述的，DCEP 建立在加密法和分布式账本技术（DLT）之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区块链。它的开发有多重目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在全球的流通，进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需求。

对北京而言，人民币需要实现国际化已经从一种理念，迅速转变为必要的目标。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监控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网络的交易后，中国决策者一直在想办法绕过这一系统。近期中美在香港国安法、所谓新疆侵犯人权、台湾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上的紧张加剧，对中国被排除在 SWIFT 之外的担忧亦如幽灵般出现。被排除在 SWIFT 之外将使中国的银行无法进入全球美元体系，这对经济稳定来说是灾难性前景。

因此，数字人民币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巩固金融主权，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可以掌握人民币交易的最终情况。DCEP 还能对美元的跨境支付主导地位形成直接挑战，尤其在已经与中国有密切联系，而且熟悉人民币的经济体，如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数字人民币将是更便捷有效的国际支付选择，交易成本也会低得多。

尽管逻辑如此清晰，人们还是时不时地质疑数字人民币能在多大程度上打破美元垄断地位。例如，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就认为，只有中国政府取消对资本流动的主要限制，人民币才会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他表示，“DCEP 本身并不会改变游戏规则，提升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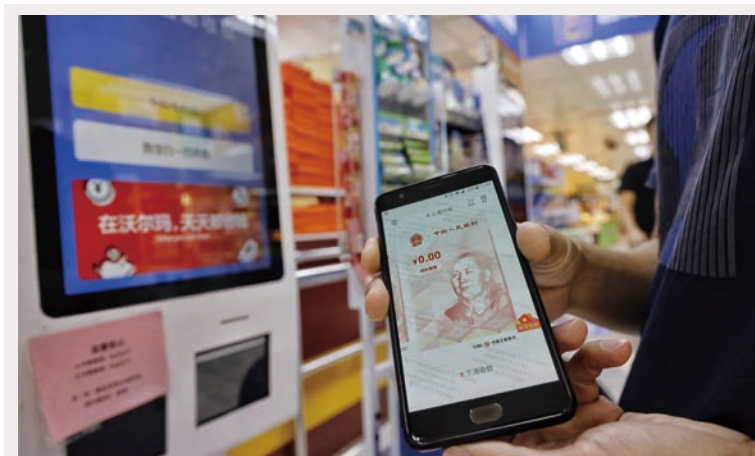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由于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更概括地说，由于国际债权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缺乏信任和信心，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仍是一个遥远的命题。然而，国际金融领域法规和制度的确定性从本质上说是相对的、动态的，对于投资者，这通常只是吸引长期资本的小障碍，在一个利率近乎为零的世界更是如此。为解决这方面问题，中国的决策者正在推行更大的战略：建立以 DCEP 为中心的新金融生态系统。

正如我在过往分析中指出的，数字人民币可以将货币流动掌控水平提升到新高度，并用更细致、更少干预的方式管理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被用来控制资本流入流出中国的通道（如香港与内地股票债券的互通），也可以因为使用 DCEP 而进一步拓展。

这一切的核心是透明度的提高，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对整体资金流动的掌控。一切都是实时可见的，加上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标记可疑行为和大规模资金流动，中国人民银行就能在危机时刻针对某项流动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精准措施，从而实现对资本账户和汇率的管理。所以说，DCEP 强化了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它将拓宽资本流动渠

“

由于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更概括地说，由于国际债权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缺乏信任和信心，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仍是一个遥远的命题。



收到数字人民币“红包”的广东省深圳市居民在商店使用这笔钱。2020年12月深圳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向居民分发了1000万元人民币（149万美元）。

“

这一切的核心是透明度的提高，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对整体资金流动的掌控。

道，同时保持对全局的控制。

具体来说，提高资本流动的透明度，将有助于中国高达15万亿美元的国内债券市场以更低交易成本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进而逐步解决可供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资产的匮乏问题，该问题阻碍着人民币获得储备货币地位。同样，基于DCEP的国际支付系统可以让中国创建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被更多国家接受。CIPS每天的结算额约为200亿美元，远不及SWIFT的每天5万亿美元。

CIPS的扩大，加上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将使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金融生态系统

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可以避开美国的制裁。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将海南作为金融改革试点的原因，其改革内容包括提高人民币可兑换性，增加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海南正在开发可在海外开展业务的境内移动支付系统，与数字人民币一样，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资本流动的跨境监控系统，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最后，中国政府正繁忙地测试新系统，以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清算。“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SWIFT与中国人民银行下属清算总中心合办的企业，该企业的目标是通过CIPS引导所有人民币国际支付，不过它仍保持着对SWIFT系统的融入，本质上其目的是加强CIPS与SWIFT的合作，而不是相反。

中国人民银行还参与各种其他项目，以整合不同的央行数字货币。这些项目包括国际清算银行的标准制定工作，以及香港金管局和泰国银行发起的一项实际测

“

基于DCEP的国际支付系统可以让中国创建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被更多国家接受。



数字人民币不会取代美元的全球地位，但它会通过三极甚至更多极，为全球货币事务引入更类似于权力均衡的东西。

试。中国人民银行的有效模拟将 DCEP 与机器学习相结合，以测试管理外币交易所货币供应时的决策场景。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同一个目的，即打造基于数字人民币的新全球支付网络。美国的金融强权肯定会受到影响。由于美元在全球的垄断地位，目前美国的金融强权是如此有效，而且无所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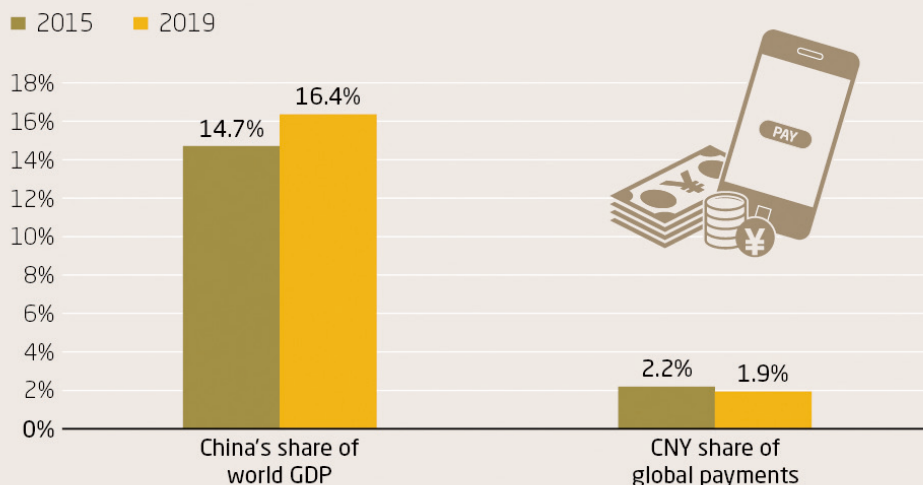
所以说，推出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战略举措。它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奠定了数字基础，该系统可以满足世界其他地区对货币多样化的需求。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称：“在一个后疫情、超低利率和多极化的世界，全球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将会上升。”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第三极，欧洲尤其担心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受挤压，它努力的重点

自然是欧元在全球的作用。尽管如此，DCEP 的推出还是有可能触发货币权力分散的演变，而不再是目前这样以美国为中心。数字人民币不会取代美元的全球地位，但它会通过三极甚至更多极，为全球货币事务引入更类似于权力均衡的东西。

此一进展最终可能导致一场对货币权力的混乱争夺，从而瓦解全球金融体系，使之分裂为敌对的阵营，全球经济增长有可能倒退几十年。或者，最好的场景是出现一个拥有同样货币锚的联盟，能够配合并协调全球支付基础设施。世界正面对着一个全新的货币维度，让我们希望后一种场景占上风吧。

The Yuan's share of global payments does not match the size of China's economy

China's share of global GDP and payments in comparison



Sources: World Bank, SWIFT

中美在军事安全领域可能的合作清单



姚云竹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有很多值得考虑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要相互接触。失败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最明显地表现在双边军事关系、或者更宏观的安全关系中。如果要为未来中美之间的合作拿出一个清单，从军事和安全领域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双方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避免因操作层面的误判和事故导致军事冲突，并进而升级为更大规模和更强烈度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战略互信不足的情况下，防止危机的发生就更为重要。为此，不断完善两国军队之间现有的危机管理机制，包括细化海空相遇时的行为准则、规范危机沟通机制的使用、明确一旦发生危机时的处理原则和程序等，都是两国军队合作的最紧迫内容。

其次，中美作为大国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责任，双方有必要就建立“战

略稳定”关系进行讨论、谈判甚至达成协议。首先需要为中美战略稳定探索一个理论框架，双方可以在什么样的力量基础上“保持稳定”。“战略稳定”的架构既可借鉴，又应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美苏的“战略稳定”是建立在双方核武库都要保持“互相确保摧毁”的能力上，并主要涉及“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两个方面的内容。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显然可以有更广泛的内容。

“

特别是在战略互信不足的情况下，防止危机的发生就更为重要。为此，不断完善两国军队之间现有的危机管理机制。



“

考虑到中美军事关系的特殊性，应该建立更大范围的战略稳定架构，还应该就维护核武器设施和核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的网络安全达成共识，就保证侦察与监测系统的太空设施安全达成共识。

考虑到中美军事关系的特殊性，应该建立更大范围的战略稳定架构，其中不仅包括核武库的规模与结构，战略防御能力与战略进攻能力的互动影响等，还应该就维护核武器设施和核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的网络安全达成共识，就保证侦察与监测系统的太空设施安全达成共识。当前，中美学术和政策界就两国未来应该如何和平共处有很多研究，包括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对比能够满足各自的安全需求、什么样的军事态势双方可以接受等。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不需要也不应该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军事能力上。对目前中国和美国都有人提出的“互相拒止”、“相互脆弱”等概念，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和政策适用性研究，更好地认识战略稳定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力量对比。

第三，在全球军备控制领域，中美亦有共同利益。拜登总统将军备控制作为政策优先，他在接手白宫后，立即宣布延长与俄罗斯的 New Start 条约。中国反对美国上届政府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强迫中国加入美俄核裁军谈判，这种要求根本就是不合理和不可行的。但是，中国对在多边和双边框架内讨论军备控制问题一直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比如，可以在五核国框架内就降低国家安全对核武器的依赖、共同推动达成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共识等进行合作。此外，中美还可以推动五核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有核武器国家对核战争与核武器的基本态度，如重申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几十年前的声明，承认“核

战争无法取胜，亦不应发生”。考虑到拜登总统在竞选时曾承诺推动美国采取“唯一用途”的核政策（即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慑止和反击核攻击），中美也可以共同呼吁五核国就“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以及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达成一致。

同时，中美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全球防扩散领域继续进行合作，如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和维护伊朗核协议继续有效等。过去，中美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和达成伊朗核协议的过程中，都曾进行过有效的合作。虽然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合作的意愿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但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地区与全球和平稳定的需要，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合作有充分的必要性。

最后，双方也有必要合作建立新兴技术（如空间、网络、人工智能等）的共同标准和使用规则，尤其是就是否和如何在军事领域使用新兴技术进行合作。如果在此过程中排斥对方的参与，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

双方也有必要合作建立新兴技术（如空间、网络、人工智能等）的共同标准和使用规则，尤其是就是否和如何在军事领域使用新兴技术进行合作。



美国在亚洲备战使和平面临的威胁上升



道格·班多 (Doug Bandow)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当两个积极性很高的大国为争夺影响力而竞争时，竞争支持者们已经做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最坏打算。但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国家领导人必须重视致命冲突的代价。

对抗中国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中国周边对其施加影响。乔·拜登的政府并未减少与中国对抗，不像他在竞选时所说的，中国是“竞争对手”而非威胁或敌人，相反，政府似乎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3月中旬对亚洲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他向北京训话，威胁说“如果中国为达到目的而进行胁迫或侵略，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将予以反击”。

美国政府正承受着华盛顿两党当中好战派的压力。例如，作为美国最重要外交政策智库之一的大西洋理事会，日前就发表了处理对华关系的所谓“更长的电报”。这个标题取自乔治·凯南著名的“长电报”，其内容是阐述对苏联的遏制政策。

尽管凯南认为华盛顿的侧重点应是政治手段，但冷战还是演变成了持续的军事对抗。大西洋理事会明确主张实行“强制性遏制”，并提出了一系列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红线”，为的是回应“中国或朝鲜对美国及盟国采取的任何核、化学或生物武器行动；中国对台湾及其离岛的任何军事攻击，包括对台湾公共基础设施和机构的经济封锁或大规模网络攻击；中国对保卫日本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和东海专属经济区主权的日本武装力量的任何攻击；中国采取的任何重大敌对行动，包括进一步造岛和将岛屿军事化、针对其他声索国部署兵力、妨碍美国和盟国海军的全面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对美国条约盟国的主权领土或军事设施采取的任何攻击行动”。

美国武装部队正在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不仅是海军和空军，陆军上将理查德·考夫曼也称中国拥有7000辆坦克和

3000辆步兵战车，并警告“如果我们不抵达那里，这一万辆战车就会是决定性的”。为此他坚称“我们必须在那里有装甲部队，以防止中国取得相对优势”。他的作战计划晦涩难懂，难道是一次占领北京的地面进攻？

作为中国好战的证据，考夫曼上将指出，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最近声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注意到“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样的声明”，也许说明了中国的侵略性。不过，许其亮或许只是回应他和同事看到的美国日益军事化（且很浮夸）的欲求。

拜登政府应该停止这种明显急不可耐的对抗。在制定政策时，可不可以点击一下“重置”？

华盛顿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表现出谦逊态度。美国人非常关心人权，而习近平政府在一些方面表现得很糟，也许名声最差的就是近来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但更多事情只是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作为回应，中国官员提到美国的军国主义外交政策，这些政策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中国政府文革结束以来的任何所为。在处理北京的错误时，华盛顿官员有必要更加稳重。

美国对海上航行自由和友好国家独立性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问题没有哪一个比保卫美国更重要，而美国并没有

“

拜登政府应该停止这种明显急不可耐的对抗。

“

美方官员觉得胜利是注定的，但投射武力的成本，要远远大于阻止武力。

处在危险中。可美国的官员却利用这些问题，为威胁在数千英里以外开战进行辩护。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军舰沿着东海岸驶入加勒比海，如果北京在拉丁美洲建立大量基地并驻扎军队，如果中国官员试图对美国的古巴政策指手画脚，如果全国人大要求在西半球更积极主动地遏制美国，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

尤为重要的是，大西洋理事会并没有确定事情的轻重缓急。美国真的应该为尖阁诸岛（钓鱼岛）等几个没有价值的岩礁，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开战吗？被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但该浅滩主权与整个群岛的安全一样重要吗？华盛顿应当为台湾去冒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吗？除了上世纪以外，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和中国的距离就像古巴与美国一样近。

美方官员觉得胜利是注定的，但投射武力的成本，要远远大于阻止武力。多次战争演习的结果并不让人觉得放心，大规模投资于新技术的计划很可能让华盛顿真正破产。美国的债务/GDP比率已经超过100%，接近二战时期的最高水平，到2050年更有可能突破200%。

华盛顿也不应指望它的盟友会热心加入美国十字军。菲律宾会帮助美国为台湾开战

吗？韩国会为了支持尖阁诸岛战争，而让自己成为庞大邻国的永久敌人吗？日本会派特遣部队，帮助我们把中国海军驱逐出斯卡伯勒浅滩吗？

当然，中国自身有明显短板。但家门口的威胁对它来说，厉害关系要大得多，而华盛顿争夺的只是影响力，不是生存权。北京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能依靠中国大陆，这也使局势有升级危险，因为美国军队将别无选择，只能打击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而这会给后者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它进行相应的报复。

也许最大的危险是美国即使胜利，也只是暂时的。如果不被彻底打垮，中国很可能倍加努力，为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做准备，以将美军驱逐出其周边地区。历史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可能的代价：为确定德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作用，我们被迫进行了两场可怕的全球争夺战。

美国和中国有许多重大分歧，然而，两国政府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仍然至关重要。将军们受聘是为了做最坏的打算，但像国务卿布林肯这样的外交官则必须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

将军们受聘是为了做最坏的打算，但像国务卿布林肯这样的外交官则必须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點知天下



Your trusted news sources
from China and HK

World | China | Hong Kong | Business | Videos



Download tap2world now!

<http://tap2world.com>

中美交流基金会简介

中美交流基金会于 2008 年在香港设立，基金会坚信，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两者的积极关系对于世界的福祉至关重要。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实体。

中美聚焦网简介

China-US Focus（中美聚焦，www.chinausfocus.com）由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于 2011 年在香港成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专注中美关系的网络媒体。中美聚焦网站为中美问题的专家、学者、智库和意见领袖搭建了一个交流观点、理性探讨中美关系的平台，成为两国民众和世界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CHINA & US Focus IS PROUD TO INTRODUCE...



A new storytelling experience bringing you up close to the fascinating people shaping our shared global future.

Weekly videos and podcasts hosted by James Chau take you on an exciting journey to 'see' and 'hear' China first-hand.

Now available on all major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chinacurrent](https://www.instagram.com/thechinacurrent)



ABOUT JAMES CHAU

James has earned a special reputation for his interviews with world leaders in politics, science and health. Amongst them,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s Jimmy Carter, Kofi Annan, Muhammad Yunus and Aung Sang Suu Kyi, and also Winnie Mandela, Arianna Huffington and Christine Lagarde. He serves a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oodwill Ambassador and UNAIDS Goodwill Ambassador.

